

打仗时先张扬自己的声势以压倒对方。这枚印章与赵声的名、字、号相符，反映了赵声的革命追求和革命精神。

赵声（1881—1911），江苏镇江人，原名毓声，字伯先。他天性聪颖，四五岁就能跟着父亲背《三字经》《百家姓》，17岁时考中秀才，第二年入江南陆师学堂。1903年2月东渡日本考察，与黄兴、何香凝等革命党人结识。同年夏回国，任南京两江师范教员和长沙实业学堂监督，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曾撰写七字唱本《歌保国》，秘密散发，鼓动人民起来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1906年初，入南京督练公所任参谋官，随后赴江阴训练新军。在新军中积极展开革命活动，加入同盟会。

1910年，在香港的黄兴、赵声收到孙中山从美洲寄来的一封信，提出在广东重新发动武装起义。黄兴回信，认为广东可再从省城下手，仍由新军做主力。不久，孙中山密电黄兴、赵声等去日本面商。6月，在日本东京，赵声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相谈甚欢。11月13日，孙中山由美国经东京抵达南洋，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集黄兴、胡汉民、赵声等开会，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以新军为主力，联络会党，在占领广州后，挥师北上，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此，孙中山一面派人联络新军，一面在海外各地筹款，以解军需。会议结束后，赵声第一个返回香港，设立机关，联系新军，确定计划步骤。1911年初，在香港成立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的统筹部，具体策划起义的诸多事项，还组成了800人的“敢死队”。在组织起义过程中，赵声任统筹部副部长兼交通课课长，废寝忘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派人携款到苏、鄂、湘、浙、赣等长江流域各省联系党人，筹建机关，发动新军，组织力量，为响应广州起义做好一切准备。起义行动前夕，赵声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统筹部原定4月17日起义，后因清吏防范严密，枪械运输困难等原因，起义延至4月27日发动。是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随后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起义军虽英勇战斗，终因兵力单薄，坚持一昼夜后失败。当赵声率起义军于4月28日晨赶至广州，起义已经告败，只有仰天徒叹奈何。黄兴等负伤逃脱，方声洞、林觉民、喻培伦等86人遇难。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失败，赵声悲痛万分，忧愤成疾，20多天后病逝于香港，年仅30岁。赵声逝世后，章太炎传报国殇，“中外之士，识与不识，闻之皆为流涕”。黄兴、胡

汉民代表同盟会作“告南洋同志书”，并致函孙中山，表达了对失去革命战友的苦痛心情。1912年孙中山明令追赠赵声为上将军，迎遗骨归葬于江苏镇江竹林寺旁。1926年镇江建伯先公园，作为纪念。

在赵声病重期间，军事秘书、参谋长凌锐一直陪在他身边，赵声将此印作为永久纪念物留给了凌锐。1950年凌锐去世，此印就由凌锐之女凌颂芬保管。“文革”期间，凌颂芬将此枚印章藏于家中地板下。后来她下放农村，又把印章小心地藏在身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凌颂芬回到南京市中医院工作。曾经有人欲高价收购此枚印章，均被她拒绝。她认为革命文物不是商品，每当看到这枚印章便能想起自己的父亲。后来，凌颂芬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不希望日后这件革命文物遗失或散落于民间，于是在2001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将这枚印章捐献给了孙中山纪念馆永久收藏。

苏艳萍 孙中山纪念馆

孙中山颁给潘受之的旌义状

该旌义状通长35厘米，通宽48.1厘米。朱红色缠枝纹花为边，嫩绿底色。上书“潘受之先生于中华民国之始 踊跃输 将军储赖济 特给予旌义状 奕代后民永多厥义 此旌 临时大总统孙文 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一日”，钐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国家二级文物。

它是南洋华侨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帝制革命活动的见证物之一，更是研究粤籍华侨和粤地对外关系的重要史料。

潘受之（1873—1962），字元康，今广东省佛山市三水人。17岁赴新



加坡随父学医，后开设广生堂大药房，曾创制“应急蝠油散”“仁丹”等中成药。1906年4月6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潘受之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于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与邓慕韩、邓青阳、居正等在南洋发动募捐，自己亦多次慷慨解囊认购国民革命债券，资助革命。后在南洋参加抵制日货运动，被当局驱逐出境。1921年至1923年间，在国民党三水县党部任职。后在广州南洋华侨兴业社、海外同志社、广州荣昌机器厂等任职。

1912年2月，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与其女孙姪、孙婉等，还在潘受之开设的坤甸广生堂大药房前合影。潘受之其人，医术高明，曾为苏丹皇及其家眷治愈疾病，与苏丹皇也颇有交情，后来潘受之回国，苏丹皇还专门为他出具了医术证明。现在这张合影和医术证明都藏于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孙中山曾说：“华侨乃革命之母。”这句话鲜明地指出了华侨从物质、舆论、精神方面支持革命活动的重要史实和巨大贡献。作为海外华侨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南洋地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根据地和大后方。而地处南洋枢纽之地的新加坡，则成为了南洋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开展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极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促使了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扩大了舆论影响。就孙中山个人而言，他一生曾八次抵达新加坡，进行各种革命活动。1907年3月，创办了《中兴日报》等宣传革命的媒体，同时通过撰写文章、巡回演说等方式，争取到很多南洋华侨的支持，筹集了大量革命所需款项。

以1911年4月广州三二九起义为例，经孙中山等人的努力，香港、北美、南洋等地共筹得157213元用于起义之用。黄兴后来报告说，广州三二九起义共用银18763元。其中超支的部分，是来自其他方面支援起义的款项。据史家估算，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各方捐款总额62万港币左右（约31万美元）。历次筹款活动，是爱国华侨们不惜毁家纾难的高尚之举，更不用说还有许多爱国华侨直接归国，亲自参与革命，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海外华侨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当年孙中山先生所感佩，后人更不能忘怀的中华民族之魂。

也正是因为如此，为了表彰各界人士尤其是海外华侨对革命的贡献，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对支持民主革命有功的人员和华侨论功嘉奖，潘受之等一众华侨纷纷获颁此种旌义状，以表彰他们对革命的贡献。孙中

山还以私人名义赠潘受之精致的坤甸拐杖，以示情如手足之意，又亲笔题写“节义留芳”四字，刻制坤甸横匾赠与潘母。

周嫦妮 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黎元洪赠劳拉的红十字武汉纪念章

该纪念章为铜质，直径5.2厘米，重42克，外形为十八星旗样式及嘉禾图案，并配有五色旗样式的绶带。证章正面铸有“武汉纪念章”字样及红十字会标志，背面铸有黎元洪戎装像及“Li Yuen Hung”英文行书。该纪念章现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辛亥革命博物馆。

此枚纪念章的主人是一名叫Elsie Laura Beckingsale



(埃尔西·劳拉·贝肯塞)的英国妇女，中文名叫白金瑞，人们更多的是叫她劳拉。劳拉于1886年9月1日生于伦敦。1911年2月，24岁的劳拉由伦敦传教社团资助前往中国，于同年5月乘江轮到达武汉，任教于武昌女子寄宿学校。她在中国工作了四年，后因病回国。在此期间，恰恰赶上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她用日记、书信和照片的形式，记录了大量的有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信息，并参与抢救伤病人员，帮助战乱中的难民和孤儿。1912年10月10日，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邀请劳拉参加武昌起义一周年招待会，并在庆典会上赠予劳拉此枚纪念章，以表彰其在武昌起义时对义军和民众的关怀与照顾。

1938年，52岁的劳拉自告奋勇再次来到中国，参与救助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军民。受过良好教育的劳拉在中国贫穷落后、战乱灾祸连连的时刻，远离家乡亲人，

放弃舒适的生活，为中国人民默默地奉献自己的赤诚之心和绵薄之力。

1983年，终身未嫁的劳拉在英国去世，享年97岁。劳拉留下的全部遗物，就是两个装着日记、信件、诗稿、照片和纪念物的小箱子，那里面充满了她多彩一生的记忆，承载着她博大的爱心，她的激情，她的浪漫，她的才华，还有她对中国这块土地无比的眷恋。

2013年，劳拉后裔安东尼·查尔斯·贝肯赛向辛亥革命博物馆捐赠了1912年黎元洪赠予劳拉的红十字武汉纪念章和劳拉关于武昌起义爆发的书信等十件珍贵文物。

郑卉 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

章太炎致袁世凯信手稿

在杭州名人纪念馆馆藏的章太炎文物中，有两封信件显得极为珍贵，即章太炎写给袁世凯的两件书信。章太炎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更是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一位坚毅的斗士，而袁世凯则是近代历史上较多争议的一位人物，在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通过其中一封书信来一探究竟。

这封信是章太炎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期间所写，之后公开发表在1913年11月9日的《顺天时报》上，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字里行间显现着章太炎为保卫辛亥

